

DOI: 10.3724/SP.J.1224.2018.00266

“工程社会学与美好生活”专刊

小城镇的社会整合功能研究

张 涛

(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开封 475001)

摘 要: 如何充分发挥小城镇的社会整合功能是城镇化进程中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从小城镇的工程属性出发, 通过梳理小城镇的演变轨迹以及工程活动在小城镇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着力探讨了小城镇作为“人工物”在不同时代的社会整合功能。在此基础上, 结合小城镇在工业社会的不同发展模式以及中国的现实国情, 尝试提出了我国在城乡融合发展道路中应遵循的若干原则。

关键词: 工程; 小城镇; 社会整合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969(2018)03-0266-10

1 引言

自工程社会学诞生以来^[1], 除了关于工程共同体的深入探讨^[2], 已有研究主要围绕工程社会学的学科属性^[3]、工程的社会性质及其对社会的积极影响展开, 例如工程对经济、教育以及科技进步的推动作用等^[4-6]。工程作为造物活动, 联结着人、自然和社会并伴随人类文明发展至今^[7], 但是学界对于工程的社会整合功能却鲜有讨论。社会整合与社会变迁是社会领域绕不开的重要议题。无论是社会整合还是社会变迁, 工程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8]¹⁵²。对于社会整合来说, 个体如何有效地融入群体进而与其他社会系统得以协调发展进而实现社会秩序有效整合和良性运行是首要问题。而社会变迁则体现了传统社会整合秩序的消解以及新的社会秩序建构的过程。工程是社会存在的物质基础, 理解其社会整合功能就成了一个关键问题。

小城镇伴随人类社会出现至今已有约6000余年, 作为一种“人—自然—工程—社会”的空间

形态以及沟通城市和乡村联系的空间聚落, 小城镇不仅承载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模式, 其演进历程也记录社会变迁中的历史痕迹和价值追求。鉴于此, 从工程“造物”和工程时空的宏观视角出发, 深入到小城镇这一“人工物”的演变轨迹中, 对其社会整合功能进行梳理和社会学讨论, 不仅能够加深对工程实践特征的理解, 还可进一步推动工程社会学研究的经验转向, 进而有助于我们理解工程在人、自然和社会多重复杂互动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同时, 将工程的研究范围和理论路向拓展到社会学维度, 有利于工程研究的交叉融合, 形成新的理论增长点并凸显社会学的话语地位; 在此基础上, 尝试进一步厘清小城镇作为“人工物”的社会性特征及其社会整合的演进逻辑, 以期为我国当前城乡融合发展实践提供本土学术支持。

2 基本概念辨析

2.1 关于小城镇

小城镇是农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收稿日期: 2018-05-14; 修回日期: 2018-05-20

基金项目: 河南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15YBRW19)

作者简介: 张涛(1982-), 男, 博士, 副教授, 主要从事工程的哲学和社会学研究。E-mail: zt@vip.henu.edu.cn

是乡村发展的中心地和进化的高阶形态。现代社会对小城镇的理解则存在多种角度,如常住人口规模、非农人口比例、行政建制级别及建成区面积是常见的划分标准;如瑞士把人口 5000 人左右的地区视为小城镇,日本的标准是 2 万~15 万人^[9];反观美国,“镇”并不具有行政区域的性质,200 人以上的社区均可自愿申请设立;英国的定义则兼顾了产业和人口因素:“一个拥有稠密的、永久的和人口相对较多并从事非农职业的地方”^[10]。就我国而言,不同部门和学科的定义也不尽相同。从行政建制来看,“镇”通常只包括建制镇(乡)这一确定的行政区划级别,建制镇与非建制镇(集镇)在经济统计、财政税收、户籍管理等诸多方面有明确区分。学界对“镇”的理解则比较多元。社会学倾向于从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角度来理解小城镇,如费孝通就认为“小城镇是一种比农村社区高一层次的社会实体的存在。这种社会实体是以一批并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口为主体组成的社区。从地域、人口、经济、环境等因素看,这类社区具有与农村社区相异的特点,但同时又与周围的农村保持着不缺少联系。”

不同理解源于小城镇在城乡间的过渡性及其发展的动态性。虽然城乡间的社会结构、经济性质和外观形态大相径庭,并在行政管理、生活和生产方式等方面存在诸多区别,但二者间并不存在一个前者消失和后者开始的绝对节点,小城镇处于“城乡过渡体”的中间状态。要精确定义“小城镇”绝非易事。当前的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镇与镇的极大差异。2011 年人口“六普”数据显示,河北的燕郊镇常住人口达 75 万,而西藏的错那镇仅不到 3 千人。镇与镇的经济规模也有着天壤之别。在《人民日报》发布的“2017 年全国千强镇”中排名第一的江苏省玉山镇,其 2015 年的 GDP 高达 638 亿元,甚至与某些地级市相当。

鉴于本文主要从较为宏观的层面讨论工程在小城镇发展中的社会整合功能,结合相关资料,我们尝试将小城镇定义为:有别于大中城市和村

庄的、具有一定规模的、主要由非农人口和非农产业活动为主体组成的社区^[11],在物理外观和社会生活方面呈现出一种由乡村向城市过渡并兼有城乡的两重性质,人口(1 万~20 万)和生产要素相对集中并对周围农村具有一定工业、商业和文化辐射力。当然,这个定义是就小城镇发展的一般特征来说的,并不妨碍我们对小城镇的一般描述与分析可以应用到集镇乃至小城市。

2.2 关于社会整合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适当的社会整合则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就初民社会而言,稳定的社会环境、简单的社会结构以及较低的社会分化程度决定了个体间高度的同质性,图腾崇拜、原始宗教仪式^[12]以及简单的礼物交换行为^[13]是主要的社会整合手段。社会整合一直存在,但直到 19 世纪末,面对欧洲在工业革命后发生的剧烈社会变迁以及传统社会秩序遇到的空前挑战,学界关于社会整合的讨论才正式出现。

所谓社会整合,就是出于解决社会矛盾、处理社会关系、有效促进社会进步的目的,将社会中具有不同的目标、利益、价值观的个体凝聚成一个有机整体并使其价值导向和行为方式符合社会的总体目标的过程。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整合可细分为文化整合、规范整合、信息整合和功能整合四大类型^[14]。

首先,社会整合可以满足社会的一体化要求。社会一体化包括但不限于统一的语言文字、标准的制度、共同的信仰、完整的管理模式等。然而,社会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存在着不同的子系统和要素,某一要素的变化往往会导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可能后果,为防止这一现象的出现,就需要对各子系统和组成要素进行有序合理的整合并形成“社会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良性状态。

其次,社会整合可以有效调适个体及群体的利益冲突。普遍存在的社会矛盾源于个体和群体间“名、利、权”的不同诉求。社会整合就是要

在人们保持利益分化与利益协调之间必要张力的基础上, 通过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有效手段, 对个人和群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进行有效划分, 找寻一种有效的利益平衡机制, 将社会矛盾甚至冲突进行有效预防和控制, 形成一种合理的、动态的社会利益结构, 使之符合社会的总体目标, 在保持协调性的基础上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进而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并保证社会的良性运行。

最后, 社会整合可以形成符合社会发展的主流价值导向和行为模式。社会的主流价值导向影响了社会成员对社会事务和社会现象的基本判断, 进而左右着人们对社会行动的选择, 只有使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员形成某种程度的共识, 社会才能具有向心力和凝聚力。因此为了实现社会的有效发展, 社会必须通过有效整合以形塑符合社会总体目标的价值导向。

3 前工业社会的小城镇及其社会整合

“筑城工程”的出现表明人类由顺应自然的自发状态转向了改造自然的自觉行为, 是社会发展的一个伟大进步。社会从简单到复杂的每一次跨越, 都伴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分化。工程活动在推动小城镇形成与发展的同时, 也在润物细无声中进行着社会整合。

3.1 城防工程: 小城镇的发端

关于小城镇的起源主要有多种观点^[15], 其中, 防卫说最有代表性。安全需求使设防行为成为人类生存的本能, 城防体系在人类实现定居文明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原始人为躲避野兽的袭击, 由个体到群居并逐渐形成聚落乃至小型原始村落, 伴随着对野生动植物的驯化改造, 人类也从游猎、采集的生产、生活方式转变为以农耕为主的定居文明。村落发展到一定阶段, 一定规模的筑城行为就成了应付外部侵袭的主要手段, 进而产生了相应的土木工程——“沟”或“墙”——这些建筑

围绕起来的区域谓之“城”。或许这些原始的城垣并不能被称为完整意义上的城镇, 但却为小城镇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防卫说在东西方小城镇发展中均有印证。汉语中“城”和“镇”带有明显的军事色彩。“城者, 所以自守也”, 意指具有防御功能的城墙^[16]; 而“镇”的本意为“一方之首山”, 即一定区域内最高最大、地形易守难攻的山, 可为一方驻兵镇守之要地。“镇”随后被逐渐引申为一个区域概念, 又称为军镇, 所以“镇”还兼具“镇压”、“镇守”之意^[17]。北魏年间, 中央政府在西北边境要塞设置军镇作为军管型地方行政机构, 开启了镇的行政建制历史^[18]。在古埃及, 距今约 5 千多年的城市伊套伊四周布满了堑壕, 城防坚固厚实, 城里套城, 体现着防卫至上的筑城设计原则^[19]。同样, 古罗马人建造城墙时首先考虑的也是防御。古罗马帝国的城墙内外两侧所预留的空地(又称环城圣地)在发生战争时可以起到很好的防御缓冲作用。恩格斯对此评价道:“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 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 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进入文明时代了^[20]。”实际上, 带有城墙的城镇已经成为现代考古学家鉴定文明存在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

城防工程有效的抵御了异族、猛兽的侵害, 这种出于安全和定居需要而形成的社会合作行为充分调动了个体与群体的积极性, 打破了初民社会基于血缘的群体界限(本质上与动物无异), 在社会差异的基础上初步形成社会的统一, 从而使社会产生了活力并且释放出具有创造性的能量。

3.2 灌溉工程: 小城镇的发展

如果说城防工程为人类进入定居时代打下基础并构成小城镇的雏形, 那么防洪和灌溉工程在促进农业生产的同时进一步推动了小城镇的发展, 实现了人类生产方式的第一次飞跃和生产力的长足进步^{[8]156}。

已知最早的灌溉工程出现于苏美尔文明的诞

生地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包括水坝和灌渠。公元前 5000 年前后，苏美尔人已经开始较大规模地依托幼发拉底河来建设灌溉系统，如在乔加马米遗址（现巴格达城西北方向 125 公里处）发现的大型农业村落以及由成型的沟渠组成的人工灌溉系统。除了农业灌溉工程，苏美尔人还修建了由大坝、池塘、沟渠组成的、具有排洪、蓄水、调节水流等功能的水利网络。随着灌溉工程规模的日趋扩大和复杂，各村落也在协作修建和维护中逐渐走向融合^[21]。

中国的小城镇发展也与灌溉工程息息相关。大约在 5000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就出现了凿井工程。在河北邯郸涧沟遗址发现的圆形水井，井径约 2 米，深 5~6 米，是中国发现最早的水井遗址之一，堪称“华夏第一井”。凿井工程可以使人们在离开河湖等地表水源较远的地方定居，表明人类已经由单纯的被动依赖河水转化为主动地开发、利用地下水，初步掌握了利用地下水资源的知识认知和手段。最为人熟知的灌溉工程是建于公元前 256 年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该工程根据江河出山口处特殊的地形、水脉、水势，乘势利导，以无坝引水为特征，堤防、分水、泄洪、排沙、控流相互依存，共为体系，变害为利，实现了人、地、水三者高度协和统一，保证了防洪、灌溉、水运和社会用水综合效益的充分发挥。都江堰建成后，“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谓之为天府”，围绕灌区也形成了星罗棋布的小城镇。

为满足农业生产需求而兴建的灌溉工程把个体分散的力量凝聚成为整体或社会的力量，从而产生一种超越“个体简单之和”的总体力量并实现了集体利益的社会整合。利益的核心是经济关系，也是人与人之间最本质的社会关系，根据利益主体的不同，利益又可分为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农耕社会的社会主体以灌溉工程为中介，在

对集体利益的维系和追求中为自身创造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不仅解决了个体和小家庭在农业生产中面临的用水问题，而且形成农耕社会中人与人的相互依存关系，为小城镇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并形塑了农耕社会中基于“机械团结”的传统社会共同体。

3.3 宗教建筑工程：小城镇的文化整合

除了物质生产，工程与其所处时代的生活方式及精神文化生活也紧密相连，这一点在宗教建筑工程的演化进程中表现的最为鲜明和突出。位于城镇空间核心的神庙、宗教等工程建筑成为了小城镇发展的精神文化推力^[22]。

在大型城镇出现之前，规模较大的定居点大多围绕宫殿或神庙建立^[23]。神庙建筑不仅是古人供奉神祇之地，同样也是其精神归宿。古埃及的尼罗河两岸布满了神庙，人们总是临近居住，以求日常供奉，沐浴神恩。而对于底比斯、孟菲斯这样的古埃及城市来说，它们从村落到集镇乃至城市的发展过程就是宫殿和神庙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进行不断扩建、增建的过程。这些城市传统上就是一些主神的崇拜中心，例如底比斯、孟菲斯和赫利奥波利斯分别是阿蒙（Amun）、普塔（Ptah）和太阳神拉（Ra）的崇拜中心。在这些崇拜中心中，恢宏壮观的大神庙在这些崇拜中心中处于核心地位，它们是神祇的居所，也是神祇与人类沟通的地方，建筑工程中的各种要素——神像、圣堂、大门、柱廊、浮雕、铭刻和徽标，全都被看成是维持宇宙正常运转的某种生命力的表现^[24]。大型神庙的聚集功能其他地方的神庙所不具备的。每逢宗教节日，这些大型神庙成为了信徒的汇聚之所^[25]。

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人口、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进一步促进了宗教文化的繁荣，催生了规模愈加宏大的宗教建筑工程。这些建筑不仅能够反映

中国古代小城镇成形过程中出现的可能更多的是宗祠或祭坛。

出当时的工程规模、文化艺术水准和思想意识状况,更为重要的是,围绕这些工程又进一步加大了人口的集聚,推动了城镇的发展。即便是现在,庙宇、教堂、清真寺等宗教建筑工程仍在很多国家支配着城镇或城市的景观轮廓和形象。这种世俗权力与宗教神权的结合对当时的城镇成形的作用是巨大的,它统一了意志和行动,激发了人的潜能,以至于之前单凭野蛮强制无法办到的事,或单凭魔法仪式无法实现的事现在可以由野蛮强制和魔法仪式相结合,靠彼此理解和共同行动在城市成形过程中逐一实现了,而且规模之大前人无法想象。对此,华丽的宫殿、恢弘的宗教建筑工程无疑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26]。

宗教建筑工程为小城镇的“文化整合”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使民众在意识方面达到趋同或统一,进而形成一种具有凝聚作用的“社会共同意识”成为维系社会的精神纽带^[27],保持社会中相对稳定的基本活动方式和社会秩序。工程的社会整合促进社会各子系统之间的有机统一并防止破坏社会统一性的因素的产生和蔓延,“既能使社会维持其作为社会系统的完整性,又能够使社会进入更高级的适应能力^[28]。

可以看出,各类工程活动在小城镇形成与发展中对社会各子系统进行了有效整合,共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习俗规则,使社会成员产生共同意识,建立了以个人同质性为基础的社会联系,并形成了传统社会中的血缘、地缘和宗教等共同体。这种社会整合概念聚焦于“文化、道德、教育、宗教联结作用,表现出显著的“非契约性”特征。

4 工业社会的小城镇及其社会整合

小城镇真正走向现代意义上的城镇化发展道路始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机器大工业生产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变迁和并建构了新的社会整合方式,使得工业革命前后的小城镇具有了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以及社会结构、性质和功能。

4.1 工程集群的出现

前工业时代的工程活动受制于有限的技术、工具和组织水平,多以分散或割裂的状态存在。工业革命已降,一系列技术的突破性创新引发了生产方式、生产组织管理形式以及经济结构等诸多方面的变革。企业作为工业生产的基本单元,也成为了“比较稳定的、持续承接或从事某些类型或某些范围的工程项目的,在较长时期存在的、‘稳态’的工程活动主体^{[1]198}”。

“现代工业发明使人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克服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又进而促进了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效率的提高,并使得工业集中在城市成为可能^[29]。”工业革命中,或因历史与偶然、或因自然资源的禀赋、或因区位特色优势,某项产业在一个区域内生根发芽进而形成优势产业^[30]。对于工人而言,该地区便产生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广阔的发展前景和较高的劳动报酬;对于雇主而言,大量训练有素的技术工人又是其所必须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在此地的结合,导致了同一产业在早期发展中的企业“扎堆”现象。而随后由于路径依赖和累积因果效应,劳动市场的共享造成了企业集聚活动,为企业节约了劳动力成本、招聘成本和运营成本,工程作为承载工业企业的主体,也走向了空间上的集群。

4.2 工程集群与小城镇的社会整合:英国

小城镇的大规模发展肇始于英国,与工业化进程相辅相成且步调一致。作为绝对先行国,英国的工业革命和城镇化进程无任何经验可循。在政府“自由放任”的政策背景之下,在资本逐利的天性之中,英国的产业布局和工程集群跟随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快速兴起,工场手工业过渡到机器大工业,工业资本取代了商业资本的主导地位,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互动实现了产业、城乡和社会结构的三重优化。从18世纪后半叶到19世纪晚期百余年时间,英国就凭借七成的城镇人口率先实现城镇化^[31]。

机器大工业生产的规模、物料流通量以及成本考量对外部条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资源和区位分布等各方面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当地的工业及城镇化进程，这也决定了英国小城镇的发展基础并非完全是原有的封建城镇，更主要是原材料产地、交通要道和劳动力充足的矿区和村庄。同时，工业生产的专业化要求企业间联系的紧密化，逐利的本能驱使具有协作关系的企业采取缩小空间距离的方式来降低成本并提高竞争力。对煤炭的海量需求首先使那些拥有矿产、交通或劳工等优势资源的地区得到了有效发展，19世纪英格兰北部地区正是依托于周围丰富的矿产资源而崛起，并迅速成为了英国首屈一指的工业区。伴随采矿业而发展起来的煤焦化工、金属冶炼、机械制造、建筑材料等重化工业工厂的规模空前扩大并具有系列化、多样化特点，在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发展的同时，促进了相关企业集中并形成工程集群。人口的集聚对周边地区的配套公共基础设施进一步提出了要求，城镇的功能也随之多元化，除了金融、运输、仓储、旅店等工商商贸服务业，公共交通、教育、医疗甚至休闲设施都建立起来，城市管理方式和民众生活方式较以前也有了质的改变。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述：“大工业企业需要许多工人在一个建筑物里面共同劳动，这些工人必须住在近处，甚至在不大的工厂近旁，他们也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村镇。为了满足他们的其他生活需要，还须有其他人，于是手工业者、裁缝、鞋匠、面包师、泥瓦匠、木匠都搬到这里来了。于是，村镇变成了小城镇，而小城镇又变成了大城市。城市愈大，搬到里面就愈有利，因为这里有铁路，有运河，有公路，可以挑选的熟练工人愈来愈多。这里有顾客云集的市场和交易所，这里跟原料市场和成品销售市场有直接的联系。这就决定了大工厂城市惊人迅速的成长^[32]”。

随着产业的发展壮大和产业链的延伸，工程

的样式和种类也越发增多，范围、体量越来越大，工程间的互补性和依赖性也越来越强，社会分工也逐渐走向深化和广化。劳动分工除了优化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它更是社会存在的一个前提条件，以功能互补的方式将社会不同的部分紧密结合起来，社会人群的异质性增强，同时出于社会交换的需要也使人们的联系日益紧密，有效地实现社会团结，保障社会的基本秩序^[33]。工程集群在推动小城镇发展的同时，越发多元的分工和“陌生入”之间的合作也打破了传统社会基于血缘、地缘等朴素情感的“机械团结”，形成了建立在异质性群体上的“有机团结”和社会整合。

4.3 有为政府下的工程集群与小城镇

英国在工业革命中形成的工程集群及其对小城镇发展的促进作用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这种在“有效的市场”背景下的自发自为的渐进式发展模式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是小城镇发展的主流。二战后的新技术革命与经济全球化不仅改变了工业发展和工程集群方式，也重塑了小城镇的发展模式，“有为的政府”变得愈加重要。

知识要素愈加关键，经济全球化更是加速了各类产业在更大范围的转移与扩散并改变了国际分工格局。除了“有效的市场”，技术转移能力、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度安排等因素同样对产业发展和工程集群有着重要影响，这对“有为的政府”提出更高要求——如何充分利用本地的各类资源禀赋，激发产业的潜在比较优势转变为竞争优势就成了不容回避的问题^[34]。具体来看，政府通过制定相关产业规划和政策创造适宜的创新环境和良性的竞合互动机制，寻找特定区域（如便捷的交通、潜在的市场、廉价的劳动力等）作为最优化的生产空间，形成紧密的产业关联和社会化分工，最终催生一些新的企业和工程集群，高度的专业化、频繁的企业间写作不断地提升生产效率和区域竞争力，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也随之

提高。如“第三意大利”、美国 128 号公路以及印度班加罗尔都体现出了这种新的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为中国参与全球分工提供了绝佳机遇。开放之初,为解决劳工成本上涨和土地资源减少等问题,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纷纷转向珠三角地区的乡镇;同时,广州、深圳等城市的工厂为削减运输和交易成本,也不断地往周边乡镇集中。在“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二者有机结合下,广东地区各产业依托各小城镇,形成了众多的专业化工程集群,一大批经济规模超几十亿甚至百亿元的镇级经济专业化生产集群脱颖而出。

专业镇的共同特点是一个镇拥有一个主导产业体系,只生产一种或少数几种产品,这种产业集聚带来了成本和专业化的优势^[35]。被誉为“服装之都”的虎门镇,就是依靠政策支持和外资投资建厂形成产业聚集并发展起来的专业镇,“村村点火,处处冒烟”一度被视为该镇工业发展的特征。从 1978 年落地的全国第一家来料加工厂开始,大批港商都到虎门开办服装、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形成“前店后厂”的产业格局。所谓“前店”,即虎门镇依托香港的外贸窗口优势,承接海外订单,从事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并进行市场推广;所谓“后厂”,则是当地企业利用土地和劳动力优势进行产品加工和制造。这种模式使得虎门镇利用产业和工程集群迅速形成规模经济,不仅是东莞首个 GDP 破 400 亿元的镇街,更获得了全国重点镇、全国纺织模范产业集群等百余项国家和省级荣誉称号。2014 年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虎门更是作为试点被赋予县级管理权限,成为了我国新型城镇化道路中小城镇发展的典范^[36]。

虎门可视为“有为的政府”借助“后发优势”,因地制宜的制定产业、户籍、土地、财税等政策、

制度形成工程集群引领小城镇发展的典型代表。从经济整合的角度来看,这种模式可以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走出乡村、离开土地,从事市场化和职业化的生产劳动,并以较快的速度进行城镇化——广东省 2017 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高达 69.85%^[37],仅次于北京、上海、天津。但是,这种快速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的进程导致传统小城镇的行政边界、社会边界、经济边界和文化边界在短期内发生了极大变化。民众的的异质性和个体的原子化程度大大提高,与建立在血缘、地缘等纽带基础上的传统社会共同体并存且交织在一起,城市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还未真正有效扩散,社会的运行缺乏有效整合,“进不去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可视为这种情形的真实写照。此外,大量人口的涌入在带来充沛劳动力资源的同时,也对小城镇的基础设施、社会管理和公共保障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十三五规划”当中就将“赋予特大镇部分县级管理权限”作为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的手段之一,也可以视为对这种情况的回应。

5 余论

小城镇从无到有、规模从小到大、社会结构从简单到复杂,工程活动与小城镇的社会变迁和社会整合之间始终存在着密切联系。工程活动的知识性、商业性、规则性、协同性以及集成性特征,不仅在人口密度、城区功能、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等物理外观层面推动着小城镇的发展,同时也从意识或精神文化方面淡化了传统的乡土情怀、地缘观念和生活方式,现代性的契约关系、竞争意识和市民文化成为主流思想观念。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3 年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指出:“城镇化不仅仅是物的城镇化,更重要的是人的城镇化,城镇的发展终究要依靠人、为

特指意大利东北部和中部的新兴工业化地区,以区别经济较为落后的南部地区(第二意大利)和经济较为繁荣但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经济面临重重危机的西北地区(第一意大利)。

了人，以人为核心才是城市建设与发展的本质。”我国正在进行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同时也是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乡镇作为中国最基层的一级的政权组织，不仅是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极和增长点，也是我国实现社会转型的关键落子。

小城镇在工业革命以来的发展模式和历程为我国提供了重要启示和发展经验。与英国等“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中“工程与小城镇的社会整合互为影响、螺旋上升”的渐进式发展模式不同，作为“后发外生型”国家，我国小城镇的发展基础是行政权力干预的超经济控制，迅猛发展的工程集群在给小城镇带来巨大经济建设成就的同时，也在很短时间内瓦解了根植于自然经济的传统乡村共同体，社会成员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日渐弱化并走向式微^[38]，在同一区域内形成社会整合的间断或不同整合机制的嵌套现象，与工业社会和城市生活相匹配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还未真正建立和有效扩散，这种“物”的现代化快于“人”的现代化现象影响了城乡一体化协同效应的发挥。

为防止出现上述各种问题和矛盾，通过梳理国内外小城镇发展轨迹和社会整合经验，结合小城镇作为“人工物”的工程属性，我们在积极稳妥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并发挥小城镇的社会整合功能中应该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从工程演化的机制和动力角度出发，平衡“有效的市场”以及“有为的政府”。正视中国作为“追赶型”国家的现实国情，既要发挥政府在政策、调控、监督等方面的有效引导，也要加强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调节方面对小城镇发展的有力牵引，只有坚持二者的“双轮驱动”，中国的城乡融合发展的步伐才更加协调、更加顺利地向前迈进。

二是从工程的复杂性角度正视小城镇在城乡融合发展中的过渡和中介角色。从发生学角度看，小城镇既是乡村发展和进化的高级状态，又是城

镇体系的基本单元，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传统性”的同时也拥有“现代性”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要充分利用小城镇在农民城市化过程中的缓冲作用，如此，既能降低其迁移和生活成本，又能给农民提供一个近距离观察和融入城市生活的窗口，为城乡融合提供一个过渡平台，减轻农民进入城市的“适应不良综合征”。这不仅是我国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中国工业经济结构转型和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形成合力分工的有益尝试。

三是从工程的系统性的角度优化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工程建设。现代化的基础设施是小城镇协调运转的保障，如果其建设目的仅仅是维持经济发展和居民基本生活，小城镇将异化为“经济生产的工具”。除了电力设施等生产性基础设施，为居民创造舒心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增强居民对小城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生活性基础设施同样重要，如提供公共服务的商业、交通以及消防、防洪、抗震、人防等防灾减灾工程。此外，公园、绿地、广场、水体、地标性建筑等市政景观工程的建设也不容忽视，这些不仅是现代文明生活的标志，而且也成为人与人沟通交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绿色平台，对于缓解改善生活空间狭窄、人与人交往空间缺乏等问题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生活性基础设施工程不仅可以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而且在提升小城镇的形象和文化底蕴、扩大社会影响力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在增加居民对小城镇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同时，有利于社会整合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 [1] 李伯聪. 工程社会学导论：工程共同体研究[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8.
- [2] 鲍 鸥. 工程社会学视野中的工程投资者[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10(6)：48-53.
- [3] 史明宇，陈绍军. 工程社会学与社会工程学辨析[J]. 学术界，2011(3)：57-63.
- [4] 马树才，李 华，袁国敏，等.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拉动

- 经济增长测算研究[J]. 统计研究, 2001, 18(10): 30-33.
- [5] Crawley E F, Malmqvist J, Östlund S, et al. Rethink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J]. 2014, 8(6): 1-5.
- [6] 栾恩杰. 国家重大工程是科技进步的牵引力——再论工程技术科学的关系[J]. 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 2015(4): 317-322.
- [7] 殷瑞钰, 汪应洛, 李伯聪. 工程哲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2.
- [8] 殷瑞钰, 李伯聪, 汪应洛. 工程演化论[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152.
- [9] 陈怡懿. 我国现行小城镇户籍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 湘潭: 湘潭大学, 2012: 10.
- [10] Holt R, Rosser G. The English medieval town: a reader in English urban history 1200-1540[M]. London: Longman Publishing Group, 1990: 3-4.
- [11] 梅克保. 中国小城镇建设的战略与管理模式研究[D]. 长沙: 中南大学, 2002: 3.
- [12] 郭于华. 仪式与社会变迁[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2.
- [13] 马塞尔·莫斯, 礼物:古代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16.
- [14] 苏国勋, 刘小枫. 社会理论的诸理论[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5: 516.
- [15] 李其荣. 对立与统一: 城市发展历史逻辑新论[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0: 7.
- [16] 辛志凤, 蒋玉斌. 墨子译注[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18.
- [17] 张厚安, 白益华. 县以下层次区划模式[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58.
- [18] 浦善新. 中国行政区划概论[M]. 北京: 知识出版社, 1995: 113.
- [19] 张曾芳. 运行与嬗变: 城市经济运行规律新论[M].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0: 4.
- [20]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162.
- [21] 邹一清. 古蜀与美索不达米亚——从灌溉系统的比较分析看古代文明的可持续发展[J]. 中华文化论坛, 2005(2): 145-148.
- [22] O'Connor D. The University Museum Excavations at the Palace-City of Malkata[J]. Expedition the Magazine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79, 21(2): 52-53.
- [23] UPHILL, E. P., Egyptian Towns and Cities[M]. Princes Risborough: Shire Publications, 1988: 19.
- [24] 徐永利, 李靖. 古埃及神庙空间序列解读——兼谈古埃及建筑语言的开创性意义[J]. 华中建筑, 2007, 25(9): 167-170.
- [25] Kemp B J. How Religious were the Ancient Egyptians?[J]. Cambridge Archaeological Journal, 1995, 5(1): 25-54.
- [26] 李月. 刘易斯·芒福德的城市史观[D].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 2016: 29.
- [27] 朱力. 我国社会整合机制的转换[J]. 学海, 2005(1): 47.
- [28] 安东尼·奥勒姆. 政治社会学导论[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135.
- [29] 刘易斯·芒福德. 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 16.
- [30] Porter M E. Clusters and the new economics of competition[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8, 76(6): 77.
- [31] 李明超. 工业化时期的英国小城镇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9: 33-35.
- [3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第2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7: 300-301.
- [33] 埃米尔·涂尔干 著, 社会分工论[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26.
- [34] Brusco S. The Idea of the Industrial District: Its Genesis in Industrial Districts and Interaction Cooperation in Italy[M]. Geneva: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Labor Studies, ILO, 1990: 10-19.
- [35] 易雪玲, 邓志高. 探索“专业镇产业学院”高职教育发展新模式[J]. 中国高等教育, 2014(z3): 59-61.
- [36] 虎门镇人民政府. 虎门概况[EB/OL]. (2016-05-12) [2018-03-10]. <http://www.humen.gov.cn/html/20160512/400.shtml>.
- [37] 广东省统计局. 2017年广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18-03-02) [2018-04-30]. http://www.gdstats.gov.cn/tjzl/tjgb/201803/t20180302_381919.html.
- [38] 王露璐. 乡村伦理共同体的重建: 从机械结合走向有机团结[J]. 伦理学研究, 2015(3): 118-122.

Study on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the Small Town

Zhang Tao

(School of Marxism,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It is an unavoidable issue that how to take full advantage of the social integration function of small towns which play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social process. Based on the engineered feature of the small towns, the evolution route of the towns and the vital function of engineering activities were analyzed as element task, and then the author put emphasis on discussing the social integration function of the towns which as “artifacts” in different eras. Through the above work, by combining with the different development modes of small towns in industrial society and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of China, the author proposes some principles that we should follow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in China.

Keywords: engineering; small town; social integration